

试析大河村类型彩陶“X”纹

鲁 浩

(郑州市大河村考古遗址公园, 河南 郑州市 450000)

关键词: 大河村类型; 彩陶; “X”纹; 鱼纹; 族群标识

摘 要: 彩陶“X”纹是大河村类型的典型纹饰, 该纹饰总体上经历了由不对称到对称的发展历程, 在“X”纹较为繁荣的大河村第四期, 形态多样, 对称特征较为明显。“X”纹的来源可追溯至半坡类型鱼纹的头部, 经过长期的演进, 完成了鱼头→长勾状“工”字纹→“X”纹的符号化过程。大河村类型“X”纹对豫北地区大司空类型产生显著影响, 使其衍生出变形的“蝶须纹”并逐渐形成自身特征。结合大河村类型地处多元文化交界地带、族群融合的背景, 以及仰韶文化晚期豫中地区河洛古国的文明发展格局, 认为“X”纹突破了单一部族标识的范畴, 成为河洛古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族群标识, 既彰显了仰韶文化的主根脉地位, 也体现了各部族融合形成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内涵。

Keywords: the Dahecun type; painted pottery; the X pattern; fish pattern; ethnic emblem

Abstract: The X pattern on painted pottery is a typical motif of the Dahecun type. It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asymmetric configurations to symmetrical arrangements. By Phase IV of the Dahecun Site, the X pattern had notable morphological diversity and pronounced bilateral symmetry. The origin of the X pattern can be traced to the fish-head pattern of the Banpo type, which, through a prolonged process of evolution, underwent a semiotic metamorphosis of three sequential stages, i.e., the fish-head pattern, the elongated hook-shaped pattern in the for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工” and the X pattern. Under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X pattern of the Dahecun type, the Dasikong type in northern Henan nurtured a derivative, the butterfly-antennae pattern,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Dahecun type exis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cultur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thnic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civilisation process of the Heluo Ancient Kingdom in central Henan during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 the X pattern transcended its initial role as a tribal identifier and became the ethnic emblem of the polity known as the Heluo Ancient Kingdom. It not only affirmed the primacy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but also embodied the fusion of diverse tribes into an integrated cultural-political entity.

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是指以大河村遗址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区域类型^[1], 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区, 后期北达新乡市郊、西至三门峡、南抵南阳唐河^[2]。百年来持续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为我们探讨大河村类型彩陶纹饰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对大河村类型彩陶纹饰进行观察后不难发现, “X”纹较为普遍地出现在多个遗址中。相较周邻文化而言, 大河村类型中的“X”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在该族群精神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多年来, 尽管学者们在研究大河村类型彩陶问题时对于该纹饰多有提及, 但并未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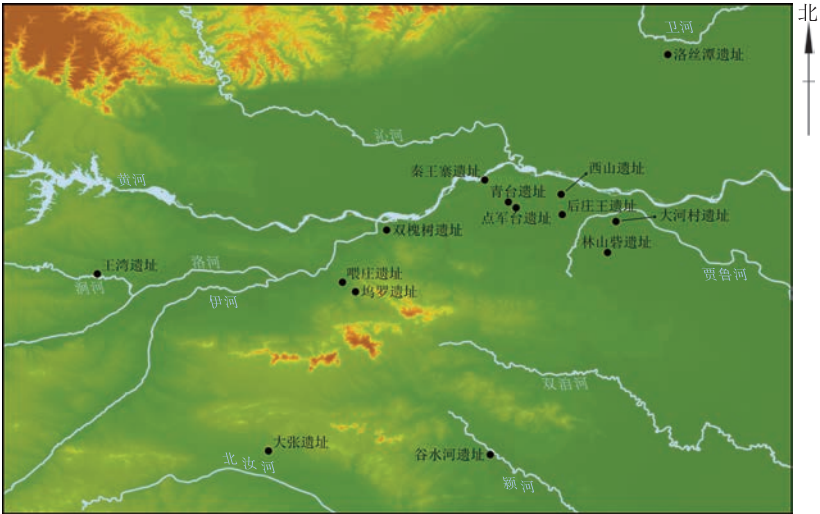
其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门探讨。本文拟从“X”纹的发现与分类、源流与演变、象征意义等几方面尝试对其进行探析, 以期对全面认识该纹饰的内涵有所裨益。

一、大河村类型“X”纹的发现与分类

初步统计, 目前可确认出土“X”纹的大河村类型遗址至少有14处, 主要分布于环嵩山地区, 中心区域是嵩山以北沿黄河南岸一带。(图一)分别是郑州大河村^[3]、秦王寨^[4]、西山^[5]、后庄王^[6]和林山砦遗址^[7], 荥阳点军台^[8]和青台遗址^[9], 巩义双槐

树^[10]、塬罗^[11]和喂庄遗址^[12]，以及禹州谷水河遗址^[13]、临汝大张遗址^[14]、洛阳王湾遗址^[15]和新乡洛丝潭遗址^[16]。（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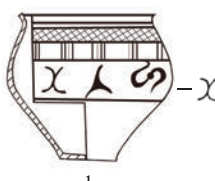
这些遗址公布资料中对“X”纹的呈现情况有较大差异。多数遗址并无“X”纹专门的描述和图像资料，如秦王寨遗址、青台遗址、西山遗址和点军台遗址；部分遗址仅有其图片信息；部分遗址“X”纹仅见于彩陶片上，无法判断其器类；还有部分遗址“X”纹为采集所得或出土层位不清晰。根据目前呈现比较清晰的资料来看，“X”纹的基



图一 大河村类型“X”纹分布示意图

本特征是主要绘于罐^[17]的外腹上部，器表抹光后施黑彩，常伴有“S”纹、平行直线纹和网格纹等。（图二）

大河村三期彩陶“X”纹，局部对称或不

分期	彩陶器
大河村三期	
大河村四期	

图二 大河村类型“X”纹彩陶器分期图

1. 大河村（W11） 2. 大河村（H254：3） 3. 喂庄（WX：21） 4. 王湾（H168：36） 5. 双槐树（H456：11）
6. 后庄王（采：368） 7. 林山砦出土 8. 大张出土 9. 谷水河（Y2：35） 10. 大河村（W8：1）
（部分器物纹饰不清晰，为便于观察，纹饰虚线为笔者自绘）

对称。如大河村W11, 图案左右对称性较差。左肩部微微下压, 右肩部上挑, 中部双线交汇重合, 尾部左右基本对称。(见图二, 1)

大河村四期彩陶“X”纹则基本呈对称状。根据对称轴数量与肩尾宽度可分为两类。

A类: 有横、纵两条对称轴, 肩尾基本同宽, 中部交汇处大多有空隙。大河村H254: 3及后庄王采: 368, 纹饰整体较瘦长。双肩内扣, 双尾内勾, 中部可见明显双线交汇, 交汇处无空隙。(见图二, 2、6) 喂庄WX: 21、王湾H168: 36及双槐树H456: 11, 纹饰四界可围成近方形。双肩与双尾近乎平行, 中部交汇处有空隙。(见图二, 3~5) 林山砦出土“X”纹, 纹饰整体较宽厚。双肩下压明显, 双尾稍内勾, 中部交汇处有空隙。(见图二, 7)

B类: 有一条纵向对称轴, 肩尾不同宽, 中部交汇处无空隙。大张遗址出土“X”纹, 纹饰整体较宽厚。肩部微挑, 尾部稍内勾, 肩部比尾部略窄, (见图二, 8) 谷水河Y2: 35, 肩部略宽于尾部, 肩部稍下压, 尾部无内勾。(见图二, 9) 大河村W8: 1, 纹饰整体较纤细, 肩部稍上挑, 尾部稍内勾, 肩部明显宽于尾部。(见图二, 10)

总体来看, 大河村类型彩陶“X”纹从第三期到第四期经历了由不对称到对称的发展历程, 在“X”纹较为繁荣的大河村第四期, 形态多样, 对称特征较为明显。

二、“X”纹的源流与演变

(一) “X”纹源流分析

“X”纹是一个对称的几何纹饰, 已然符号化。关于彩陶上几何形纹饰的产生, 过去的研究似乎已有定论, 即认为大量的几何纹饰都是源于象形纹饰, 是象形纹饰逐渐简化的结果^[18]。

大河村类型的主要文化来源为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19]。陕西关中一带的地层叠压关系, 支持了庙底沟类型起源于半坡类型的说法^[20]。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部分纹饰的演变一脉相承^[21], 是同一文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22]。基于以上认识, 探索“X”纹的来源应该主要从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象形纹饰入手。

《西安半坡》发掘报告对半坡类型鱼纹进行了开创性的详细研究, 不但列举了象形鱼纹的主要形式, 还识别出由直线三角、弧边三角等元素组成的典型鱼纹^[23]。可以看出, 半坡类型鱼纹从鱼头到鱼身都呈现出几何化的趋势, 鱼头与鱼身已经开始解体, 作为构图元素或单独的图形出现。

在庙底沟类型彩陶中, 鱼纹构图元素已经完成了拆解与重组。鱼头与鱼身往往不再组合出现, 而是在拆解重组后单独出现。鱼身在拆解重组的演化中完成了符号化, 最终成为了由两条曲线相扣组成的符号。(图三)

半坡晚期至庙底沟时期, 鱼纹的头部相比早期的写实风格, 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显得更加抽象。鱼头部位纹饰的演化, 主要有以下4种方向。(图四)

方向1: 鱼头圆点化。此类鱼纹尾部特征较为明显, 头部只用圆点来表示, 虽然所见数量不多, 但广泛分布于庙底沟类型范围内, 如灵宝南万村、灵宝北阳平和西乡何家湾等遗址^[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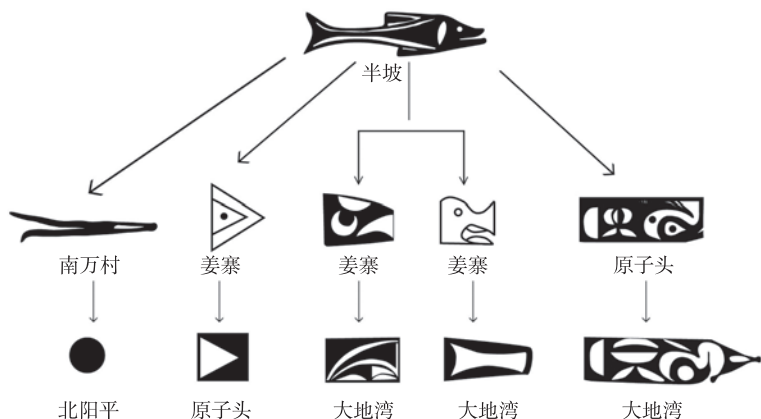
方向2: 鱼头三角形化。此类鱼纹鱼头部位用较为规则的直线三角形表示, 内部或有圆形表示眼睛。此类纹饰主要发现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秦安大地湾等遗址^[25]。

方向3: 鱼嘴夸张化。鱼头部位的鱼嘴或呈弧边三角形留白, 或突出牙齿形态, 曲线内凹成对称的四边形。此类纹饰主要发现于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华阴南城子等遗址^[26]。

方向4: 鱼头组合化。鱼头内部带长勾状



图三 半坡晚期至庙底沟时期鱼身演化示意图
1~4. 西安半坡 5. 陕县庙底沟
(笔者据原报告绘制)



图四 半坡晚期至庙底沟时期鱼头部位演化示意图
(笔者据原报告绘制)

“工”字纹。较为清晰的组合化鱼头主要发现于陇县原子头、秦安大地湾和灵宝北阳平等遗址^[27]。组合化鱼头的演变，正是大河村类型“X”纹的来源。

鱼头部位组合化的纹饰，最主要的是一种双瓣式花瓣纹与圆盘形的组合。如在陇县原子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鱼纹彩陶盆上，双瓣式花瓣纹与中间绘有圆盘形的圆形组合出现在鱼头的位置。(图五，1)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半坡类型彩陶中，至少有三件彩陶片绘出了同样组合的纹饰^[28]。(图五，2~4)

由此可见此类图案组合在半坡类型晚期已经出现，并且与鱼纹或者说是鱼头形象有着密切联系，至庙底沟时期则更多脱离了鱼体^[29]。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史家类型时期^[30]，彩陶构图元素趋于曲线化。观察取代鱼头部分的图案，可发现图案中均有长勾状“工”字纹黑彩并以此构成鱼头的主体轮廓^[31]。苏秉琦亦肯定了长勾状“工”字纹是由鱼头发展而来^[32]。这种用长勾状“工”字纹表现鱼头或者代替鱼头的表现形式较为抽

象，具备了符号化的特征。至庙底沟类型，鱼纹则几乎完全几何化^[33]。有的长勾状“工”字纹甚至完全脱离了鱼头，形成连续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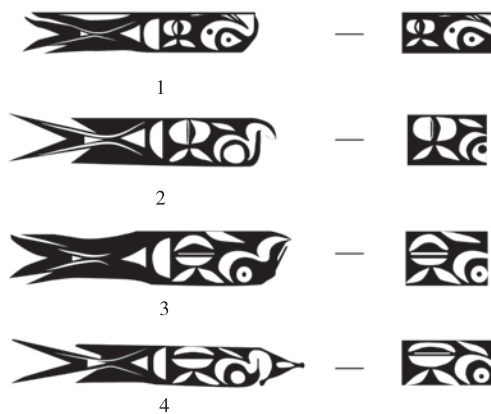
(图六)

大河村类型的“X”纹在上述长勾状“工”字纹的基础上，进一步符号化，用更加简洁的方式装饰在罐上腹部。最终，鱼纹的鱼头部位经过长期的演进，完成了鱼头→长勾状“工”字纹→“X”纹的符号化过程。由此可知，大河村类型“X”纹应是符号化的“鱼

头”形象。

(二) “X”纹的扩散与演变

大河村类型“X”纹对周边的仰韶时代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对豫北地区大司空类型的影响最为明显。大司空类型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尤以漳河和卫河流域为多^[34]。整个类型的分布范围仅一万多平方千米，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袖珍型地方类型，且出土的彩陶几乎全部为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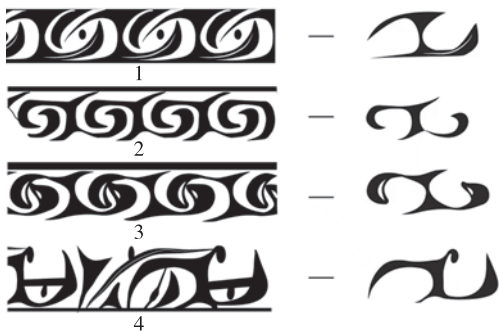
图五 半坡晚期至庙底沟时期鱼头位置图案组合
1. 陇县原子头 2~4. 秦安大地湾
(笔者据原报告绘制)

何形花纹^[35]。

关于大司空类型的源头，张朋川认为其是从大河村类型演变发展过来的^[36]，陈冰白认为其受到了庙底沟类型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37]，严文明认为其由钓鱼台类型演变发展而来^[38]，王全金等认为其是在庙底沟类型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该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钓鱼台类型及黄河南岸的大河村类型等文化因素，再与当地文化特点相融合而形成的^[39]。从器形上看，大司空类型的碗和敞口钵与大河村基本相同；从施彩上看，大司空类型也出现了大河村类型典型的白衣衬地的风格；从纹饰上看，大司空类型的弧边三角纹是常用的造型因素，并且常见大河村类型典型的“S”纹、睫毛纹和斜方格纹。此外，大司空的诸多彩陶纹饰包括“X”纹在内，也来自黄河南岸的大河村类型，是进行地方化的变形后形成的。

“X”纹在大司空类型中变形产生的彩陶纹饰，学界称之为蝶须纹，在安阳大司空^[40]、鲍家堂^[41]、大寒南岗^[42]、大正集老磨岗^[43]，磁县界段营^[44]、下潘汪^[45]，邢台柴庄^[46]，邯郸永年洺关^[47]、百家村^[48]和浚县草店^[49]等遗址均有出土。（图七）与大河村类型相比，大司空类型“X”纹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在所饰器形上，大司空类型“X”纹



图六 庙底沟类型长勾状“工”字纹
1. 灵宝西坡 2. 灵宝阙东 3. 夏县西阴村 4. 陕县庙底沟
（笔者据原报告绘制）

大多数饰于盆、碗等器形上，大河村类型的“X”纹则大多饰于罐上。

2. 在所饰位置上，大司空类型“X”纹更靠近口沿，有的直接在口沿上饰一道黑彩，“X”纹饰于其下或与之相交。大河村类型的“X”纹多饰于器物上腹，上部往往还有网纹或平行直线纹。

3. 在纹饰风格上，大司空类型显得粗细不均，并且上下卷曲程度不均，上部微卷或“退化”，下部则内卷较多，有的已呈旋涡状。

4. 大司空类型的“X”纹往往单独使用，大河村类型的“X”纹则有平行直线纹、网纹等组合使用。

由此可见，大司空类型“X”纹受到了大河村类型的影响，并且在发展中完成本土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三、“X”纹的象征意义

大河村类型分布于环嵩山地区，恰处于中原、江汉与海岱文化系统的交界地带，文化面貌复杂、文化因素多元^[50]。正因如此，对大河村类型纹饰内涵的研究难度较大。

目前学术界对“X”纹内涵的研究还不够丰富。苏秉琦认为大河村彩陶“X”纹饰于“S”纹两侧，是加弧形栏杆简化的结果^[51]。这是基于花卉体系得出的结论。由前文可知，此纹饰最早出现于鱼纹的鱼头部位，是逐步简化而来的鱼头符号。符号化的鱼纹“形逝意存”“得意忘形”，但其本身的象征性并未改变，这也是维系其生命力的能量^[52]。关于鱼纹的象征意义，学术界主要有图腾崇拜说^[53]、女阴说^[54]和鱼龙说^[55]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鱼纹整体的象征意义，对我们探讨“X”纹的象征意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不能直接套用。对“X”纹意义的研究，需要考虑其分布地区的地域特征及在不同部族的认知体系中被接受的广泛程

度。

王仁湘曾对庙底沟文化鱼纹的构成元素进行了详细分析,鱼纹拆解重组后构成了一个“大鱼纹系统”。他提出史前人类就是要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表达彩陶主题,以此打动自己再去感动心中的神灵。同时指出,这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虽然无鱼之形,但仍然有鱼的内涵^[56]。而简化鱼头亦是对鱼文化信仰体系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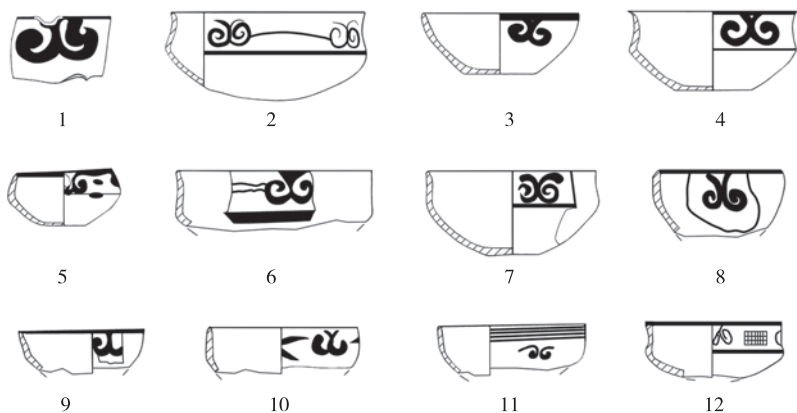
传承鱼文化信仰的大河村类型人群,具有多元的文化因素特征。考古材料证明此处存在大量的民族迁徙和交融的证据^[57]。大河村类型陶器群中常见来自大汶口文化的背壶、宽肩壶、平底尊、圈足尊、豆、杯,以及极有可能受大汶口文化平底尊影响而演化出的尊形甗等^[58],大河村遗址还发现少量具有浓厚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墓葬。此外,一些屈家岭文化遗存散存于河南中部仰韶文化晚期的地层与器物群之中,如圈足杯、倒梯形凹面足鼎和双腹豆等^[59]。不啻如此,有学者通过对大河村类型“双联式”文化的研究,发现这种文化意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很可能代表了中原腹地多元外来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态势^[60]。不难发现,

大河村类型的先民很可能是以华夏黄帝集团为主体,融合了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等部分移民而形成的族群。在族群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新的族群形成以后,信仰体系的创新似乎不可避免。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鱼头部分抽象化以后,已经具有了不同象生图案相融的意味^[61]。作为鱼头部分纹饰进一步抽象,从而符号化的“X”纹,能更加隐晦地表达主体族群的信仰来源,又淡化了这种象生性图腾的原始特征,符合新族群的信仰需求。

从聚落研究的成果来看,大河村类型时期已进入古国阶段。豫中地区高等级大型聚落兴起,区域文化面貌趋同,社会统治格局逐步确立。在大河村四期,豫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双槐树为文明中心,青台、西山、大河村城址群组成拱卫之势,也显现出点军台、尚岗杨、站马屯、楚湾等聚落围绕的河洛古国的轮廓。在此阶段,拥有河洛古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大河村类型人群,也有政治认同的物化需求。正如王仁湘指出,鱼纹是一种政治或军事组织或者更大集团的徽识^[62],符号化的“X”纹,或许正是新族群与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物化表现。“X”纹在此时或许起到了表达“更大的集团”徽识的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X”纹广泛分布于环嵩山地区以黄河南岸一带为中心的大河村类型范围内,由鱼头形象简化而来,深刻影响了豫北冀南地区的大司空类型,其反映的并不是一个部族或氏族,而是属于一个族群共有的认知体系。“X”纹应是用作



图七 大司空类型遗址所见“X”纹(蝶须纹)

1. 鲍家堂(H4) 2. 老磨岗(H1:42) 3、4. 界段营(H21:1、H10:1)
 5. 柴庄出土 6. 洛关(T1③:28) 7. 百家村出土 8. 下潘汪(H74:102)
 9. 大寒南岗(采:2) 10、11. 草店(T2②:11、H2:1) 12. 大司空出土
- (此图比例不一,为笔者据原报告绘制)

一个新的族群的标识,一是表明各部族接受仰韶文化作为新群体文化的主根脉,二是体现各族属融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甚至是政治共同体的物化象征。关于这个新族群和其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标识是否唯一,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a. 安志敏. 裴李岗、磁山和仰韶: 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 考古, 1979, (4).
- b. 安志敏.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 考古, 1981, (3).
- [2] 李昌韬. 试论“秦王寨类型”和“大河村类型”. 史前研究, 1985, (3).
- [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河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162~394.
- [4] a. 李昌韬. 秦王寨遗址与秦王寨类型. 中原文物, 1981, (3).
- b. 图见张朋川. 中国彩陶图谱.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447.
- [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 文物, 1999, (7).
-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后庄王遗址的发掘. 华夏考古, 1988, (1).
- [7] a.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郑州西郊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通讯, 1958, (2).
- b. 陈星灿, 主编. 中国出土彩陶全集: 4: 河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221.
- [8] a. 郑州市博物馆. 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 中原文物, 1982, (4).
- b. 张松林, 郭光生. 点军台遗址文化分期与仰韶文化遗存试析. 中原文物, 1988, (1).
- [9]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87, (1).
- [1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2021, (7).
- [11] 巩义市文管所. 巩义市坞罗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调查. 中原文物, 1992, (4).
- [12] 同[11].
- [13] a. 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省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77, (2).
- b. 同[7]b: 220.
- [14] 同[7]b: 242.
- [15]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4).
- [16] 新乡地区文管会, 新乡县文化馆. 河南新乡县洛丝潭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 1985, (2).
- [17] 不同报告中对该器形称呼不一, 有的称为缸, 有的称为罐, 经过观察分析, 二者属于同一器类, 本文中统称为罐。
- [18] 王仁湘.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下). 四川文物, 2009, (3).
- [19] 同[4]a.
- [20]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 西安半坡.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 b. 西安半坡博物馆, 临潼县文化馆. 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73, (3).
- c. 姜寨遗址发掘队.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 考古, 1975, (5).
- d. 西安半坡博物馆, 临潼县文化馆. 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记录. 考古与文物, 1980, (3).
- [21] 王仁湘. 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376.
- [22] 张宏彦. 从仰韶文化鱼纹的时空演变看庙底沟类彩陶的来源. 考古与文物, 2012, (5).
- [23] 同[20]a.
- [24] 同[21]: 427.
- [25] 同[21]: 521, 532.
- [26] 同[21]: 426.
- [27] 同[21]: 477.
- [28] 同[18].
- [29] 同[18].
- [30] 严文明. 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 // 仰韶文化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22~165.
- [31] 李新伟.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鱼鸟组合图像. 考古, 2021, (8).
- [32]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24.
- [33] 同[18].
- [3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2).
- [35] 同[30].
- [36] 同[4]b: 104.
- [37] 陈冰白. 略论“大司空类型” // 青果集: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72~84.
- [38] 严文明. 大司空类型彩陶之分析 // 考古学研究: 八.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17~142.
- [39] 王全金, 葛海洋, 张琼文. 大司空文化彩陶再分析. 黄河·黄土·黄种人, 2021, (24).

- [40] 同[34].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 安阳鲍家堂仰韶文化遗址. 考古学报, 1988, (2).
- [4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 考古, 1965, (7).
- [43] 同[34].
- [4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 考古, 1974, (6).
- [4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75, (1).
- [46] 唐云明. 河北邢台柴庄遗址调查. 考古, 1964, (6).
- [4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永年县洺关遗址试掘简报. 文物春秋, 1990, (4).
- [48] 罗平. 河北邯郸百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65, (4).
- [49] 此遗址为1965年北大师考古调查时发现和试掘. 见[38].
- [50] 秦存誉. 秦王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洛阳考古: 30.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1: 41.
- [51] 同[32].
- [52] 王仁湘. 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 彩陶解读之一. 华夏考古, 1999, (4).
- [53] 同[20] a: 217, 218.
- [54] a.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略论. 中国社会科学, 1988, (1).
- b. 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07.
- [55] 石兴邦. 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 从考古资料探索“中华龙”的起源和发展.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3).
- [56] a. 王仁湘.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 四川文物, 2009, (2).
- b. 同[18].
- [57] 张国硕. 先秦人口流动民族迁徙与民族认同研究.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1: 45~53.
- [58] a. 栾丰实. 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 考古, 1996, (4).
- b. 靳松安. 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45.
- [59] 靳松安, 张建. 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看中国早期城市起源.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2).
- [60] 张海. 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333~337.
- [61] a. 同[31].
- b. 赵春青. 从鱼鸟相战到鱼鸟相融: 仰韶文化鱼鸟彩陶图试析. 中原文物, 2000, (2).
- [62] 同[21]: 457.

(责任编辑: 王 涵)